

出

版

史

料

CHUBAN SHILIAO



## 稿 约

本刊为史料性刊物，专事搜集、刊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内的出版史料，其中尤以五四运动至一九四九年这三十年间的史料为主，适当兼及古代和当代的重要资料。凡属下列稿件，均欢迎投稿：

一、关于出版单位(包括重要社团所设有的编辑部门或出版部门)的回忆和研究，诸如该单位的创设和发展，经营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二、关于出版界重要事项的记述和研究，包括某一方面、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回忆及历史文件资料的汇编、辑录等。

三、关于出版界著名人士的生平和研究，包括自传、年谱、评传、编辑生涯、轶闻轶事、日记、书信、访问记、调查录等。

四、关于重要书刊的编印实录、版本、编目以及图书评介资料的辑录等。

五、对各种出版史料所作的补充、订正、考证和专题研究以及出版掌故、珍闻、随笔等。

六、除征集文字稿件外，还欢迎推荐符合本刊内容需要的照片、图片或原文的复制件等，并请附上简单说明。

七、来稿请寄上海绍兴路 5 号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稿件署名听便，但请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以便联系。

出 版 史 料 第一辑

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版

编 辑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绍兴路 5 号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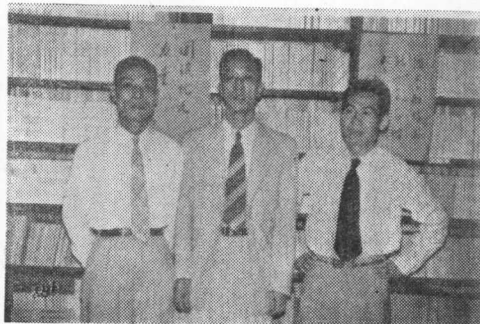
书 号 7259·003

定 价 0.60 元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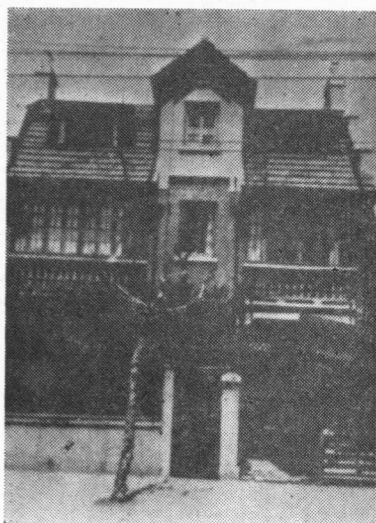
生活书店创办人邹韬奋



三联书店成立时的三位负责人  
自左至右：沈静芷、黄洛峰、徐伯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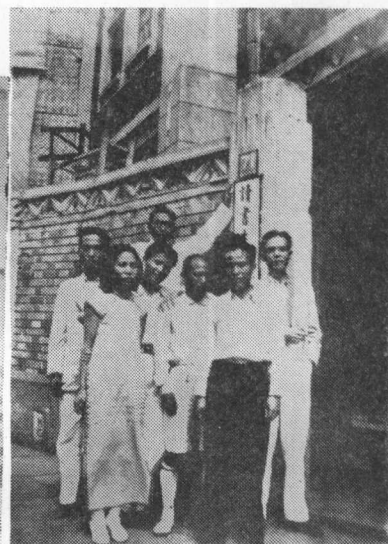
读书出版社创办人李公朴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社址  
(原上海辣斐德路四四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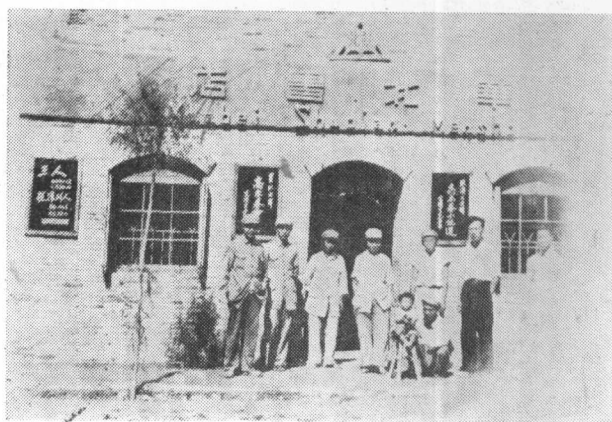
新知书店重庆分店(一九三八年九月)



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分社及工作人员  
(孤岛时期, 上海斜桥弄七十一号)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新门市部开幕(一九七四年七月)



延安华北书店

11916/13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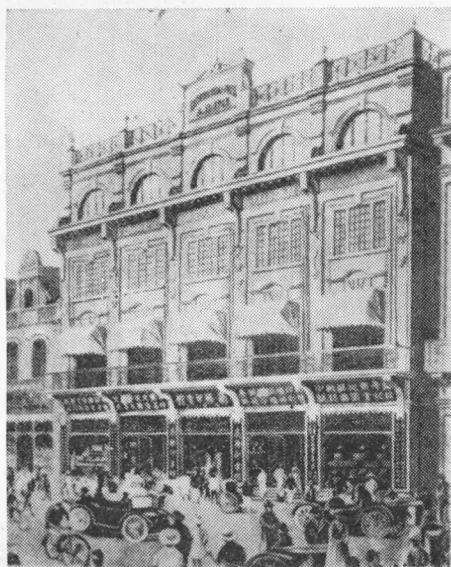
##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创办人、馆址及部分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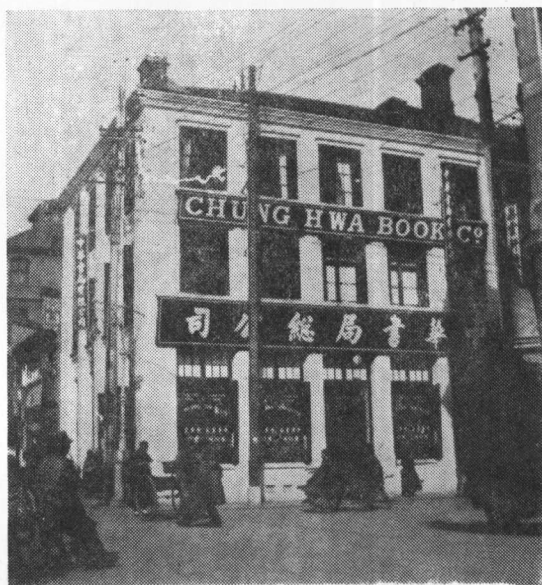
张元济, 历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编译所所长等职



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遒



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旧址(原上海棋盘街)



中华书局总公司旧址(原上海四马路棋盘街)



商务印书馆一九〇四年出版的教科书



中华书局解放前出版的古籍和辞书

出 版  
史 料

第一辑 目录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

共同努力办好《出版史料》(代发刊辞) 赵家璧 ( 1 )

---

笔 谈

出版史料和出版事业	叶圣陶 ( 3 )
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陈翰伯 ( 4 )
令人神往的出版史料	姜椿芳 ( 5 )
祝贺与希望	徐行之 ( 6 )
继往开来	陈虞孙 ( 6 )
研究出版工作,繁荣文化事业	李俊民 ( 7 )

---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

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	徐伯昕 ( 8 )
纪念生活书店五十年	邵公文 ( 12 )
一个战斗在白区的出版社——记读书生活出版社	范 用 ( 24 )
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徐雪寒 ( 41 )
我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从读者、撰稿人到编辑	戈宝权 ( 52 )

---

韬奋与出版(选载) 钱小柏、雷群明 ( 57 )

---

党在早期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	曹予庭 ( 64 )
回忆上海书报流通处	董受之 ( 72 )

---

商务印书馆今昔	高 崧 ( 73 )
---------	------------

中华书局的七十年	李 侃 ( 79 )
----------	------------

---

陈望道与大江书铺	邓明以 (87)
《太白》主编谈《太白》	尚 丁 (91)
《修辞学发凡》的版本及其影响	宗廷虎 (95)

回 忆 录	海燕十三年	俞鸿模 (98)
	《七月》作者与海燕书店	胡 风 (114)
	《可爱的中国》的印行	刘哲民 (116)
	回忆广东曲江“新建设出版社”	陈 荡 (118)

人 物 志	忆舒新城先生	陶菊隐 (121)
	望百高龄犹著书——记包天笑	郑逸梅 (128)

解放前的上海年画业	徐志仁 (131)
郑午昌与汉文正楷印书局	吴铁声 郑孝遼 (134)
上海滩上的“一折八扣书”	平襟亚 (136)
小谈“出版标记”	陈巧孙 (141)
解放前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象记(一)	朱联保 (144)
解放前上海福州路(文化街)一览	上海市出版协会 上海书店 沈俊盛制图 (146)

---

《出版法规汇编》编目(1906—1949年) (147)

---

书 话	黄炎培与“生活”二字(钱小柏)(113) 关于“新知”、“读书”的店名题字(一知)(146) 李求实与《革命歌集》(曹穉子)(97) 《前哨》的木刻刊头(小柏)(135) 《可爱的中国》的版本(阳)(71)
	我国最早的文摘刊物——《集成报》(雨札)(130) 最早的白话刊物(廷)(130) 康德著作的最早中译本(陈应年)(140) 《物种起源》和它的中译本(慧)(143)

---

编后 (158)

封二: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照片)  
 封三: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创办人及馆址(照片)  
 封面设计: 任 意 栏名篆刻: 储招明 题头尾花: 陆全根

---

## 共同努力办好《出版史料》 (代发刊辞)

赵家璧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于去年初宣告成立时,章程中主要任务项下,有一条说:“组织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撰写出版工作回忆录;收集、整理并组织出版出版史料,特别是上海出版史料。”此后,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筹备,最后专门组织了一个编辑小组。在有关各方大力支持下,《出版史料》丛刊创刊号终于出版了。写在纸上的条文成了现实,大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而兴奋的。

上海是我国近代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源地,又是近代、现代出版事业的中心。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大书店,都是在四马路棋盘街附近这一弹丸之地创立、成长而发展起来的。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在这三十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里,这条文化街上,又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中小书店和出版社(也不完全都开设在这条街上)。它们称为新书业,以示有别于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老牌大书店。它们偏重于文艺和政治读物,由于密切接触时代的脉搏,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其中更有在党直接或间接领导下的,所以胡愈之同志说:“每次革命运动,出版工作都走在前面。”<sup>①</sup>以二十年代来说,党从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建立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曾在上海先后成立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等,出版马、恩著作和革命书刊,向中国读者第一次有计划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理论。民办的亚东、泰东、北新和光华等书店和出版社,也为五四时代进步作家出版了大量文艺作品,至今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和称颂。到三十年代一开始,出版战线上的斗争,愈趋激烈和残酷,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捕杀革命作家和编辑,查禁普罗文艺,四马路上的进步书店,封闭的封闭,关门的关门。以后,为配合军事上的反革命“围剿”,明目张胆地在上海推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用原稿检查制度企图扼杀革命文学于出世之前;用暗杀、绑架、排黑名单和写恐吓信等卑劣手段,迫使作家停笔,书店停业。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革命的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被它吓倒,新书店和新出版社前仆后继,坚守出版阵地。他们紧跟时代的步伐,顶住狂风恶浪,把群众急需的精神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手中,唤醒人民,团结人民,宣传进步,宣传革命。结果,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军事上一样地一败涂地。在这场斗争中,党领导的南强、湖风、生活、读书、新知等起了主力的作用;其他如开明、天马、大江、现代、文化生活、上杂和光明等,对进步出版事业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上海沦为孤岛以及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期间,党仍然一直在文化出版战线上领导着,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着更为复杂而艰巨的斗争。四十年代崛起于上海而作出贡献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有群益、海燕、峨嵋、平明、上海出版公司等。从全国范围来说,遍设各地的进步出版社也都经历了艰苦的斗争。特别是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九年,革命圣地延安创办了解放社、新华书店,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出版了大量的革命读物,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全国解放前夕,

<sup>①</sup> 胡愈之:《发刊词》,《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

新华书店已遍布各地。

解放后，上海所有书店和出版社，按照党的政策，分别逐步纳入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轨道，企业和个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继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过去的书店和出版社，不管规模大小，也不论它当时的政治态度如何，它们的历史资料都有加以搜集、编写、整理和保存的必要，有参考价值的，将来还可以发表、出书。就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一九六一年，上海成立了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参加的老编辑、老出版工作者多达数十人，其中有曾主持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先生，曾主持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先生等。他们根据各人的具体经历，分头撰写回忆录；有的专题，还用集体回忆专人执笔的方法。十年浩劫，汪李诸老，先后谢世，但文献编辑所的资料，大体幸得保存。现在这个机构虽不复存在，这批资料却为办好本刊提供了良好基础；同时本刊的创办，也承担了文献编辑所当年因客观条件没有能够完成的出版任务。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于一九七九年底成立后，全国出版工作者都庆幸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一九八〇年创刊的《中国出版年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创举。《年鉴》辟有《出版史料》专栏，两年来已发表了十多篇重要文章，这给有志于此者树立了好榜样。不久前，又值商务庆祝成立八十五周年，中华庆祝成立七十周年，在纪念活动期间，组织并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出版了专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也庆祝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并在作家、编辑、出版工作者中，掀起了一股“写三联”的热潮。所有这些都说明编写出版史料，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普遍的重视，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好兆头。这也为办好本刊，形成了一个适宜的气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回顾“文革”前，这方面的文章，报刊上不很多见。原因当然很多；象我这样的人，就不敢触及这个角落。记得一九五七年五月，知识分子的头脑有些发热的时期，应《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之约，我第一次连续发表了两篇《编辑忆旧》，反应强烈。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那位好心肠的编辑同志却因此挨了批。就是这两篇回忆文章，“文革”一开始，第一张贴我的大字报上，便被指为典型的颂古非今的大毒草。我还记得“文革”前一两年，文献编辑所负责同志曾几次动员我写些有关“良友”和“晨光”的回忆史料，我都婉辞谢绝了。我怎么能再替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呢？今天，这类可气又可笑的事已一去不复返了。与我从同一条道路走过来的老出版工作者，个个心情舒畅，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只要牢记：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忠于历史、忠于读者，大家都可以写；而且也都愿意趁此余年，贡献最后一点力量。

我曾在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呼吁：出版史料要大家动手来写！我当时仅指老编辑、老作家和老出版工作者而言。现在刊物出版了，看起来要扩大范围，向全国大专院校的师生们，全国各地社科院的同志们，各地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全体中青年出版工作者呼吁：希望大家都来踊跃参加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史料编写工作。出版工作是一个国家文化积累的展现，也是建设我国精神文明的基石，而出版史料更是文化思想工作的历史反映。这里是一个未经深入发掘的地下宝库，出版史料的价值，不仅有关出版业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在乎它涉及到近代、现代史、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等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出版史料的搜集范围，决不限于作为中心地点的上海，而应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各个革命根据地。据从国外回来的学者们普遍反映，他们都感叹我国各项资料工作的贫乏和落后。对于这类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大量劳动的工作，老知识分子限于自然条件，确实能力有限。因此，殷切希望中青年知识分子来共同努力。只有发挥了老中青结合的精神，才能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把这个新生的、前所未有的资料性刊物——《出版史料》办好！并且要越办越好！





★  
笔谈

出一种关于出版史料的刊物,我想是有意义的。意义不在于为史料而史料,而在于鉴往察来,也就是通常说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出版事业不断发展,日益昌盛。

历代官修大部的丛书和类书,私家编撰刻印的各种书籍,雕版排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各个地区的特点,书铺书贩流通书籍的实况,诸如此类,都属于出版史料,而且都有参考价值,当然是这个刊物的好题材。不过我想,为了推进当前的出版事业,有关近百年来出版事业的题材似乎应该多占些篇幅。为什么?因为当前的出版事业跟古来的出版事业很不相同,跟清末维新以来的出版事业却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一脉相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有很多需要衡量短长,实事求是,去短取长之处。所以我以为有关近百年出版事业的题材要多一些。

我说当前的出版事业与解放以前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不同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书刊要排版,要印刷,要装订,这是工业。出了书刊要发行,要卖出去,这是商业。可是排版先得有稿子,稿子要作者写出来,编辑者编出来,这又是什么业呢?我要回答得严重些,这是教育事业。你出的书刊无论深的,浅的,通俗的,专门的,总之影响人们的见识和思想,你不是在当人们的老师吗?所以出版事业的性质是工业、商业、教育事业三者兼之,三者之中,教育事业应居首要地位。而在旧社会,出版事业掌握在私人手里,既是私人,即使能顾到教育方面,总不会比顾到商业方面的多,就是说,营利为先,无利或赔本的生意总不

## 出版史料

和

## 出版事业



叶圣陶

做。至于完全不顾到教育方面,把出版事业看作唯利是图的商业营生的,可以举出来的例子也并不少。解放以后的出版事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为公不为私,这才能够把教育看作先决条件,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要是在教育方面做得差,那么工业方面的排版印刷装订和商业方面的销售发行无论做得怎么好,利润收入无论多么多,也算不得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特点,本质上与旧社会的出版事业不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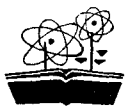
出版事业的教育效果怎样,在表册帐簿里是看不出来的,得看对读者的影响怎么样;而影响又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检查明白的,总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清出版物对读者的见识和思想究竟有益还是有害。所以出版事业首先要抓紧撰著编辑这一环,不惮斟酌再三,不厌屡易其稿,务求做到尽可能的完善;同时对排版、印刷、装订、发行等工作也决不放松一丝半毫,这才能够不断发展,日益昌盛。

就目前来说,群众对出版事业的意见非常之多。这也是有原因的。一则读者不但多了,而且范围广了。什么人都要读书,有权利读他希望读的书,要使所有的人的不同的要求都及时得到满足,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二则出版事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因而容易顾此失彼,各个部门配合不协调,各个环节衔接不紧凑。最突出的表现是一切行动都慢,审稿慢,发排慢,印刷慢,发行慢,连复一封极平常的信说稿子已经收到,也得隔个把月。在咱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任何人任何事业,列为第一条的信念是为人民服务。出版事业当然也是如此。群众对出版事业的意见那么多,那么大,总得考虑改进的

---

## 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



陈菊伯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一种刊物，它的名称是《出版史料》。我完全赞成，而且决心大力支持。

新闻界早已出了不少史料和回忆录。我们出版界稍为晚了一些。但是现在来抓这件事，还不算太晚。

在上海编印这个《出版史料》，还不仅仅因为上海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它是个出版中心，更重要的是因为进步的出版事业始终是和我党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自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以来，在军事上，他就对我党我军发动“围剿”。最后我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围剿”就彻底失败了。

与此同时，反动派还在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文化围剿”。在时间上大致和反革命军事行动相等，大约长达十年之久。反动派挟其雄厚的资本，办了很多出版社和书店，他们广积纸张，出书品种极多，售价低廉，可就是无人问津，奈何奈何？

---

办法。至少有一件是可以立刻办到的，就是提起精神来，尽可能把工作做得快些。真要力求改进，中外古今的好经验都可以借鉴，中

国民党反动派居于统治地位，它祭起一切武器来对付进步文化界。与出版事业有关的，它手中的重武器是所谓“官价纸”。它把可供印刷用的一切纸张控制在手，划出一部分，售价极为低廉，专供反动派自己用。另一部分非“官价纸”，价格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进步书店只能以现款去买这种纸，这一下子在经营上就十分困难了。

历尽千辛万苦把书编好、印好、发行出去以后，反动派往往一纸命令宣布禁售或到书店予以没收。至于查封书店、逮捕职工之事，更是经常发生。经济上的打击，政治上的迫害，使我们出版界同仁完全处在战斗的第一线，对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到了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以后，青年大量接受进步思想，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也同样彻底失败了。

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当年在思想战线的的一个方面军——出版界是有过重大贡献的。出版界的这些可歌可泣，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事迹，是完全值得记载下来作为后人的教育材料的。

说到思想方面的力量，那就正好相反，不管你反动派如何穷凶极恶，进步出版社印行的进步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是始终受到读者的热情欢迎的。有人由于阅读革命书籍，甚至被反动派抓去坐牢，但是，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物质力量。这不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思想斗争的史料吗？

所以，《出版史料》这个刊物的出版，我完全赞成，而且决心大力支持。并希望大家也积极支持，共同办好这个刊物。

外古今的坏经验都可以作戒。所以这个关于出版史料的刊物，对于推进当今的出版事业必然有很多好处。

## 令人神往的出版史料



姜椿尚

二十年代初，我在私塾读四书，常见塾师向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邮购书籍和图片，从那时起就很向往这些能供应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图书的出版机构了，并把这些出版机构看作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编辑之府、印刷之官。一九二八年夏，年事稍长，从故乡来到上海，还特别要求父母带我到望平街、棋盘街去走一周，瞻仰一下商务、中华两座大楼。只在橱窗外观望一下窗内陈列的书刊、仪器和文具，仍有莫测高深，令人起敬的感觉。等到一九三三年再到上海这个出版中心，已是二十几岁的人，虽然不再有神秘之感，但在棋盘街这些地方徘徊，在整条福州路上来往彳亍，看到这样多的书店栉比林立，店堂里和橱窗里摆满中外古今的书籍，特别是许许多多新文学的作品和各种各样文艺刊物，还是叹为观止。对于读书、编书、写书、出书、买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限于自己的水平，逼于必须终日奔波方能聊以糊口的生活，尤其是革命任务在身，不及顾此。

出版事业的诱惑之力，还是在我身上起着时起时伏的作用。这还由于我在青年时代做了将近十年的通讯社、电讯社、报纸、画报的工作，始终与印刷出版有些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到了上海又为刊物写稿译稿，为出版社翻译出书，和出版社、印刷厂、书店打了好几年的交道，多多少少成了出版事业的同路人。

由于特殊形势的安排，特殊任务的承担，一九四一年，我在上海“孤岛”主编《时代》杂志。当时由于形势的一再改变，为了适应逐步改变的新形势，《时代》居然从一个周刊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相当编译力量，并具有自己印刷厂、装订作、门市部、发行网的出版社；出版的杂志、日报、书籍居然也能在望平街争得一席之地，在福州路成群的书店和全市大量的报摊、南北若干城市和游击区争取到销售发行。时代出版社——这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特殊出版社，初期挂着“苏商”的招牌，度过了租界、“孤岛”、敌伪、国民党统治的几“朝”困难时期，终于迎了解放后的新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任务，在一九五三年解散。

一个没有出版工作经验的人，也算尝了十年多这一工作的苦乐，初步满足了从童年起就向往的一种愿望。

想不到经过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参加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又与编辑、印刷、出版这一系列进入更高政治、文化、技术阶段的、规模更宏大的出版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编辑与印制百科全书是十分复杂和要求严密的学术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工作。它和过去的出版工作，和中国历史上好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出版工作是有机的发展和延伸。

在出版的历史中，我深感出版界要费很大的气力整理中国自古以来的雕版发展史资料，广泛搜集近代印刷出版史料，要详尽搜罗和研究现、当代的出版史料，为出版事业的继往开来做出贡献。

我过去神往于出版事业，现在就更神往于出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与著述。

# 祝 贺 与 希 望



## 徐行之

由上海出版协会编辑的《出版史料》与读者见面了，这对出版界来说是件大好的事，我衷心祝愿它的创刊。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应该尽力把它做好，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一九〇九年开始，我就在杭州的印刷所做学徒了，多年来一直在印刷战线工作。一九二一年冬初，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搞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当时我的

名字叫徐梅坤。一九二三年，我担任了党的江浙区委书记，同时仍一面在印刷所做工以维持生活。党的“二大”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出版发行中央机关政治刊物《向导》周报，由陈独秀、蔡和森等任编辑工作，我接受党的委托，担负了党刊的出版印刷工作。每期稿子由我到陈独秀、蔡和森的住处取来，晚上我和几个学徒一起秘密印刷，印好后再去发行。那时的条件很艰苦，但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充满了信心。当时《向导》在国内影响很大，是党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党的出版发行印刷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我虽然已是个九十岁的老人了，但每当想起这些，就感到十分激动和高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党的事业是这样，出版发行印刷工作也是这样。我希望出版印刷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从而使出版事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上海出版协会成立不久，便编辑出版了《出版史料》，真可谓抓到了痒处。抓出版史料正是上海出版界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解放之前的上海，党领导下的出版战线，是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方面军。在那个战斗的岁月，人们总还记得，作者、译者、编者和印刷者、发行者之间密切协作的关系，就象各个兵种，团结战斗，亲密无间。

如果再往上推，那么，鸦片战争之后，戊戌政变以来，百余年间，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出版事业的前进的足迹，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百余年内留下的丰富的史料，需要我们去搜集整理。至于

### 继



### 往



### 开



### 来



## 陈虞孙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的历程，反映在出版战线上的更是丰富多彩。

整理史料，是为了现在，更加是为了将来。我们必须把前辈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如实地保存下来，以利于今后的发展。

史料贵乎存真，不能稍涉虚假，贻误后代。真正做到以古为鉴。读史是为了创造发展历史进程。因此，写史料，不宜象天宝宫女说玄宗那样，发思古之幽情。更

不宜利用写史料而采取曲折迂回的手法来表现自己。总之，一切遗老与市侩，在史料工作中是不容涉足的。

现在，为了四化建设，抓两个文明，大力培养、选拔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文化，要靠书籍的出版来传播与继承，二者不可分离，这是众所周知的。出版工作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包括编、印、发行三个过程，每一个过程，又都各自成为独立的体系，如果不通过学习与研究，它们就不可能从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壮大，从而也会影响到科学文化的发达与进展。

中国是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早在九世纪初，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活字版印刷，古籍汗牛充栋，这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后来有了铅字排印，更是一个飞跃。书籍出版的数量大大增加，标志着出版工作的发展，反映了我国从近代以至现代的国家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把包括编、印、发行三个大环节的出版工作，当作一种科学来研究，在我们还是一个新课题。

我们要对出版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就要搜集充分的资料，积累历史成果，总结经验教训，革旧布新，这样才能促进学术文化的繁荣。从这个角度出发，《出版史料》的发刊，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适应时势的迫切需

## 研究出版工作

## 繁荣文化事业

要的。

《出版史料》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这是我们一定能够办好这个刊物的信念和保证。《出版史料》的出版，将对促进四个现代化、促进出版工作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五十年代初，组织上调我来上海主持文艺书籍的出版工作，虽然我是从那时起才算正式从事出版工作的，但我与出版工作最初的接触，却早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那时我还是个青年，曾主持过刊物的主编工作。后来也写过小说，如《跋涉的人们》等，虽然写得不多，却总算与书籍的出版工作有过久远的关系。之后，在战争年代，我的工作即便不是专门从事出版工作，可是与书籍或与书籍的出版还是有联系的，并且感情很深。现今，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史料是时候了，也不容再迟延了，这个任务，上海出版协会已经担当起来了，我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当和大家一起，努力协同办好这个刊物。



李俊民

出版事业中，不论编辑、印刷、出版各个行档都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对这个重大问题，必须大抓、紧抓。事在人为。没有人，一切事业都成空话。而人，并非没有。就要有人去发现、去培养、去选拔。

编辑、出版史料，正是为培养出版人才提供了切合中国国情实际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教材。我们的教材既不是怀旧复古的，又不是背离国情，一味崇洋的。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向前看的。

出版协会抓《出版史料》，确实抓得很好。既抓出了史料，似乎进一步抓史料研究，也成为应有之义了。我相信，出版协会一定会考虑到如何把研究工作抓上去。如果既抓原料，又抓理论研究，相得益彰。以这两方面的成果作本钱，有计划地举办讨论会和讲习会，把培养人才抓上去。我相信，对今后的出版事业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祝出版事业不断前进！



# 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



——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

徐伯昕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诞生较早的是生活书店，它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分别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

三书店经过十多年的独立经营，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实行全面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继续到现在。三书店完全合并之前，在极为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共同的对敌斗争中，三书店的同人长期同甘共苦、互相砥砺，培育了团结的良好基础。回想起当年的战斗岁月，使人胸怀激荡，感奋不已。

## 患难兄弟 同心协力

三家书店在初创时期，由于各自发展的过程和主观条件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可是，三家书店的性质和目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努力奋斗。三家书店所致力出版事业，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家书店在他们分别诞生之后，除了受到敌人制造并强加给书店的种种迫害而外，三书店相同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穷困。新知书店在创办时用“募股”方式筹集了六、七百元。记得一九三〇年《生活》周刊社设立书报代办部时，只用二十元印了一份书目，就这样开展了业务，此外并无其他的资金和开办费用。

三家书店之间的互助合作，在初期主要是工作上的互助合作。新知书店创立初期没有门市部，所出图书完全委托生活书店总经售。抗战爆发后，三书店由上海迁到汉口，党的长江局决定把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在国统区用中国出版社名义印行，此事交由新知书店全权办理。事实上，新知由于人手的关系，中国出版社的书籍有一部分是交生活印行，新知印刷的部分也委托生活总经售。这时生活书店已经有三十多处分支店。

抗日战争初期，三书店同时在大后方增设了许多分支店。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国民党卫戍区宪兵、国民党特务借口检查，到汉口各家书店门市部任意查抄三家书店出版的书籍，投寄的邮包被扣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几个月之后，国民党中宣部又实行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所有这些，引起三书店负责人的高度警惕，并采取行动进行斗争。

生活书店的主要创办人邹韬奋同志为反对图书杂志的任意查抄和原稿审查，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第一、二次大会上，接连提出提案，据理力争，两次提案都在会议上获得多数通过，但国民党却蛮横无理，对决议置之不理。在这两次斗争中，三书店的立场是一致的，并且动员和团结了一批出版同业发表声明热烈支持，作为后盾。

撤离汉口后，三家书店负责人齐集重庆，有事可以随时共同商量，并自然地形成了不定期的碰头制度，我代表生活，黄洛峰和徐雪寒代表读书、新知。每次碰头不拘形式，有对形势的分

析,有相互的情况通报,有对共同有关问题的商讨,有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研究对策,等等。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由徐冰同志和三书店负责人经常联系。这种不定期的碰头制度,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

### 遭受惨重打击 向敌后开展工作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活书店西安分店被查抄,二十七日遭封闭,所有图书、现款以及家具,连同工作人员行李衣物,被全部洗劫一空,甚至连租房的押金也从房东那里要走。经理周名寰被拘捕,后移送集中营,因受严刑迫害并患病,不幸在集中营牺牲,当时年仅二十余岁!

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生活书店有十六处分店被查封或被迫停业,新知书店也有九处分店遭到同样的命运,三书店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的达数十人之多。

生活书店第一批十六处分店受到摧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生活书店的迫害并没有停止,而且更变本加厉了。到一九四〇年六月,生活书店所建立的五十六处分支店,除五处是因战局关系撤退外,又有二十多处被摧残,全国只剩下六个分店。一九四一年二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把仅存的六个分店中的五个加以封闭或限期停业。读书和新知也遭到同样的恶运。最后,三书店只各留一个重庆分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暂时保留性的措施。

可是,在任何压力、威胁和诱惑下,三店同人没有屈服。相反,越是在艰险的情况下,大家斗争的意志越是昂扬,决心要想尽办法把革命出版工作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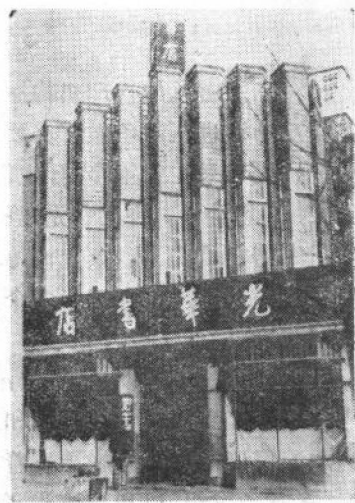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读书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先生访问延安时,毛主席曾到招待所看望他,在谈话中,毛主席谈到:“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谈话时,生活书店较早去延安的杜国钧同志在座,他把这一消息传到了重庆。

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初夏,党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找三书店负责人谈话,指示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三书店于当年九、十月分两次派人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后来在韬奋逝世后,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

这一年的秋季,新四军挺进苏北,上海地下党与三书店驻沪人员商量,派干部到苏北和苏中开设大众书店,因三书店在上海设有联络机构,苏北根据地出版工作坚持的时间较久。以后苏中的大众书店,也改名为韬奋书店。

皖南事变之后,遵照党的南方局的指示,三书店的中心转移到香港。徐雪寒先去上海,后来进入苏北。黄洛峰和我都去香港。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是三书店在国统区同受惨重打击,实行合作转向敌后根据地开辟出版工作基地的时候,也是三书店部分联合的开始。



大连光华书店

## 扩大团结 坚持斗争

在三书店总的管理机构撤离重庆之前，遵照党的指示，采取了一些紧急部署，为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抗战以来的三年多内，生活书店的力量比较暴露，考虑在国统区应当化整为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斗争，因此首先把精干的力量和组织机构掩护下来。从皖南事变到解放战争胜利，生活书店在重庆、桂林、上海等地办的化名自营和投资合营的出版机构以及和出版工作有关的贸易运输机构，共有三十多个。三家书店在以上三地加上桂东、广州、北平办的相同性质的机构，总计有四五十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我和韬奋同志在东江游击区分手之前，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进展，并于一九四二年八月我从桂林专程去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周恩来同志着重指示，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我们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将已办机构逐一排队：第一线出版机构是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侧重于出版理论性的书籍和现实抵触较少；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采取稳重隐蔽的作法。在沦陷区和抗战胜利后的收复地区，也都按三条战线的原则部署。一九四三年秋，我由桂林转往上海工作。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寇向湖南、广西发动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仓皇溃退，国统区广大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民主运动。以黄洛峰同志为首的三书店留渝同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重庆的书业界，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在文化出版方面推行的高压政策，展开了攻势。

一九四三年，以三书店为核心，联系了二十多家政治态度比较进步的书店，发表了一个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消息。接着在十二月，成立了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黄洛峰被推选任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先生任总经理。一九四四年五月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一个联营书店，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御用书店作斗争。一方面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要求保障小书店的利益；一方面进行政治方面的斗争，五月三日参加了重庆整个文化界要求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九月，重庆、成都、昆明文化出版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齐心合力地发动了一个拒检运动。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形势，内心虚弱，不得不宣布自十月一日起废止图书新闻检查。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

## 全面联合 迎接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重庆三家书店的门市实行合并，人事方面完全组成一个班子，并正式开始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招牌。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生活书店同人，闪电般地进行了复店工作。读书、新知也很快恢复在上海印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知不久也开设了门市，三书店的领导中心又集中到上海。在武汉、广州、上海、北平等地也设立了联营书店，团结的书店从二十多家增加到五十五家。除了联营书店，在重庆以及在上海还成立了出版业联谊会，同国民党把持的书业公会进行较量。由于三书店的共同努力，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以及党的政策文件，马、恩、列、斯的理论书籍，都陆续和收复区的读者见了面。



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上海除生活和新知的门市部外,还办了华夏书店,偏重出版解放区的图书。三书店更进一步合作,在北平办了朝华书店,在广州、长沙办了兄弟图书公司。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发动全面的内战,对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民主运动加紧了压迫。三书店首先派干部去胶东解放区,在烟台成立了光华书店。接着,又派干部到大连,开设了光华书店,并创办了印刷厂,大量印书。后来,又在哈尔滨开辟了出版和发行工作的基地。到东北全区解放时,大连、安东、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城市都设立了光华书店,还在沈阳成立了区管理处。《资本论》和《鲁迅全集》等巨著很快在解放区印行。东北所出版的图书,不仅供应东北一个地区的需要,而且曾一度成为华北几省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一些新解放城市图书的主要货源。

石家庄解放后,三书店急速派遣干部到石家庄,成立了新中国书局。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又相继在济南、徐州、开封成立了同名称的书局。天津、北平解放后,又分派干部在两地成立了新中国书局,在华北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出版事业变本加厉地施加压迫。五月底重庆三联书店经理仲秋元被逮捕,关押进渣滓洞。后来特务又到书店抢书,还声言要继续捕人,重庆三联书店不得不停业。仲秋元经多方营救,才于重庆解放的前夜获释。

一九四六年秋,内战全面展开,为保存力量,争取海外的广大读者,并便于和解放区联系,三书店的领导中心于一九四七年秋季再次转移到香港,积极为迎接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好准备。

一九四八年秋,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三书店全面彻底合并的条件已经成熟,十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成立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三联总管理处迁到北京,决定于八月十五日起取消光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名义,统一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三书店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参加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来,三书店自己也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作家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爱护,没有在党领导下的三书店工作人员的坚强团结,斗争就不可能坚持,更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今天,我们不是纪念三书店的功劳,而是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出版事业方面所建立的伟大功绩。

重庆三书店联合时,曾发表告同人书,指出:“这种合并,不是结束,而是团结;不是退守,而是前进;不是衰老,而是新生;不是缩小,而是发展。”在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致力革命出版事业五十年的时候,我们衷心祝愿三联书店这一革命出版事业永葆革命青春。



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查封生活、新知、读书等三分店的密令